

的版本為收藏家所好，市面上流通著以科舉學子為買家的便宜、品質較差的「廉價版」經典。

然而，並非每個人都是出版普及下的受害者，知識分子出版自己的著作或文選，作為推廣與以文會友的工具，但也往往捲入對抗朝廷權威，批判國家政策的指控當中，特別是同時在朝為官的文人。本章末尾討論蘇軾的烏臺詩案，在此案的相關記載中曾七次提到蘇軾的相關作品付梓，而每次提及都伴隨著一段蘇軾藉由將著作流通市面，以譏諷時政的指控。傅教授指出烏臺詩案與其後的數次相關案件，模糊化印刷出版與手抄本之間原有的公／私領域界線。雖然直到南宋人們都可自由地出版書籍，但仍須時時警惕著內容。

第五章的主軸是印刷文化與視覺文化之間的交纏，並且聚焦於書法。書法重視字體的「氣」與「神韻」，看似和雕版印刷本質相斥。相對於標準化且生硬的文本複製，書法家透過與文字與墨跡，在書寫行為中召喚出

藝術。但書法的優劣如同藝術品，實無一客觀的準繩可依循。因此，即使是歐陽修之類的大家，也偶爾陷入自我懷疑當中。至少在北宋，書法與印刷的關係不如想像中的針鋒相對。本章討論米芾的「刷字」、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、模仿木刻版字體的仿宋體等，著重精英士人經驗的核心，以及透過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理解印刷術的發展，如何影響北宋視覺文化的創造。

本書引用相當數量的中文原典、文學創作及評論，目的是勾勒出書裡的核心人物——宋代知識菁英階級，在印刷出版發展下進行文化創造的歷程。時代劃分雖止於北宋，但亦提及時至南宋，印刷已經深入民間成為不可或缺的行業。相關領域著作尚有國立成功大學張高評名譽教授，於近期出版之《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研究：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》（元華文創，2025年2月），可供研究者一併參考。（洪俊豪，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碩士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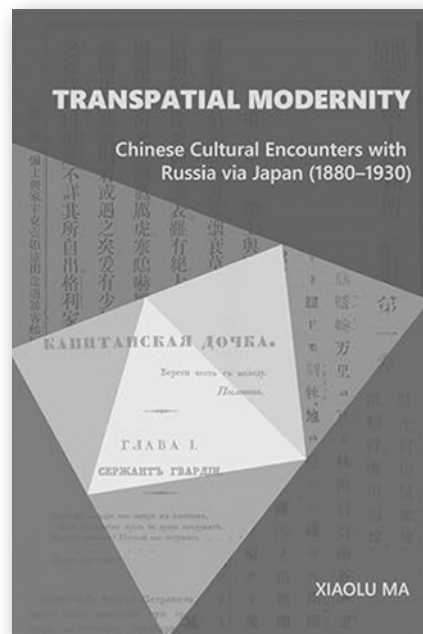
Transpatial Modernity: Chinese Cultural Encounters with Russia via Japan (1880-1930)

Xiaolu Ma

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24

360 pages, ISBN 978-067-4295-83-4

本書作者馬筱璐（Xiaolu Ma）為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碩士、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，現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科助理教授。專長為中俄比較文學研究。本書為其第一本專著。作為一位使用英語、研究俄國文學、熟悉日語的中國人，作者在求學過程中感受到一地區的語言、文化和政治時局如何對知識分子的思考產生影



響，這促使她開始關注 19 至 20 世紀初的俄國文學如何通過日本翻譯，在中國轉譯與變形。

除去謝辭、導論與結語，本書共分為五個章節，分別是「流動性與媒介性：俄日中接力式跨文化轉譯」、「重新包裝的情感：情感論述的迴圈跨文化轉譯」、「革命空間的重塑：俄國虛無主義者的分歧與變形」、「人道主義或個體性？托爾斯泰人道主義的全球跨文化轉譯」、「雜交與變異：魯迅語言改革中的平行跨文化取徑」。這五個章節涵蓋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 20 年代，俄國文學、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風格的變化、思想與意象的流動。作者通過數個案例的研究，強調「日本」在文學傳播過程的中介角色。

在導論裡，作者提出「非同步跨空間現代性」（nonsynchronic transpatial modernity）概念，重新從「空間」的交流審視中國的現代性。其中，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，在明治維新後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與思想。而日本的文學譯本又獲得中國的知識分子青睞被翻譯進入中國。作者認為，這一場跨空間的旅行，讓中國的「傳統」得以嶄新的方式回歸（頁 24）。

第一章，作者討論數個翻譯的案例，比如魯迅通過二葉亭四迷的翻譯接觸到果戈里（Gogol）的《狂人日記》；或是蘇聯文學運動，經日本左翼文學運動，影響了中國左翼文學運動，這些例子都反映出了「日本」作為「文化中介」的關鍵地位。

第二章聚焦於「情感」（sentiment）轉譯，著重探討俄國作家普希金（Pushkin）〈上尉的女兒〉（The Captain's Daughter）和萊蒙托夫（Lermontov）〈貝拉〉（Bela）的日譯與中譯表現的情感特徵。當日譯者為了日本讀者市場，將俄國角色「東亞化」——運用中國古典文學常見的「才子佳人小說」形式，結合儒家的道德情感，這些方式也隨著中國譯者的引介延續至中國的譯本，並且在中國創造出嶄新的政治意涵。

第三章延續第二章的主軸，探討俄國的虛無主義敘

事如何透過日本傳入中國。在俄國，暗殺沙皇的虛無主義者（nihilist）的恐怖事蹟在歐洲報章雜誌上甚囂塵上，日本將這群恐怖分子翻譯為「虛無黨」，中國讀者接受了日本的翻譯，並將敘事進一步「中國化」，塑造虛無主義者為革命英雄。作者認為，這種敘事策略，一方面影響了晚清的革命運動，也成為塑造中國現代革命英雄形象的基石。

第四章側重在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思想如何通過日本進入中國。其中，日本譯述托爾斯泰思想時，將其視為對抗天主教封建主義，並結合社會主義、和平主義等觀點進行解讀。中國知識界吸納日本的譯述，如周作人便將托爾斯泰的人道思想與個人主義結合，形成獨特的人道文學理念。

第五章以魯迅的語言改革和跨文化翻譯為主題，特別是留日期間，魯迅將日語作為中介語言，發展出了「硬譯」（hard translation）策略，刻意保留外來語的表達方式，挑戰既有語言規範。這種文學轉譯創造了語言革命，促成中國語言的現代化發展。

作者藉由豐富的案例，提供讀者了解近代中國接受俄國文學歷史脈絡。不僅嘗試跳脫出過往研究中國現代性提出的「東 vs 西」二元論，著眼於俄國、日本與中國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；也進一步論證 19-20 世紀之交，中國的現代性是通過俄羅斯與日本「接力式轉譯」的跨文化互動所塑造。在理論層次上，提供讀者重新檢視中國現代性的討論框架，並揭示日本作為中介者的積極意義。

當然，本書還能夠再進一步發展，第三章探討虛無主義敘事在日本與中國的傳播，可以更深入挖掘當時暗殺沙皇的俄國革命者（或云恐怖分子）在歐洲出版的回憶錄，這些回憶錄一定程度美化了「虛無主義者」的形象，這些形象經由日本和中國譯者轉譯，進入兩國的政治脈絡，共同塑造了中國現代革命英雄的形象。（詹宜穎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組員）